

兩座工廠制芬太尼銷美 美司法部起訴二名中國公民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中国公民颜小冰(40岁,Xiaobing Yan音译)和张剑(38岁,Jian Zhang音译)因为涉嫌各自在美国散播芬太尼等鸦片类制品，分别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联邦地区法院遭起诉。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导，被起诉的一名中国公民在中国至少有两座化学工厂，一次能制造上吨的芬太尼制品。

根据美国司法部10月17日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表示：“张(剑)和颜(小冰)是第一批被列入综合优先组织目标(Consolidated Priority Organization Targets, CPOTs)名单的中国公民。”“被告据传涉嫌运输大量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鸦片至全美各地，买方大多通过网络和邮寄递送购买。这些毒品据说已经在美国许多州造成死亡和伤害，也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悲惨度日。在川普总统和司法部长塞申斯领导下，我们追缉提供致命毒品者，来报复我们的社区。”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还说：“我们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在两个案件中被大陪审团起诉。第一个案子在密西西比南区，另一个

在北达科他州。据称这两人被控参与策划在美国分发大量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我提醒你们，这些都是指控。被告仍然被假设为无罪，除非在法庭上被证明有罪。这是第一次有两个中国人被定为我们所说的美国执法机构

美国司法部新闻稿表示，除了这两位中国公民，因为相关案件而被起诉的还有五名加拿大公民，两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位新泽西州居民。

不过，根据《今日美国》(USA Today)报导，颜小冰和张剑目前应该位于中国，虽然在美国遭到起诉，但没有被羁押拘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导指出，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款，罗森斯坦相信中国会针对这些被告采取适当的措施。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表示：“芬太尼是由前体化学品生产的，我们对这些前体进行了国际控制，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的芬太尼大多数来自中国，如果不是全部来自中国的话，不是在那里制造的就是用来自中国的化学原料生产的，所以我们正在寻求中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打击这些实验室，并确保中国政府跟我们一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罗森斯坦还说：“中国的芬太尼销售商利用互联网直接向美国客户出售芬太尼。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使用多重身份来隐藏其真实位置，并掩盖了利润返回中国的路径。他们利

用芬太尼分子可以多种方式改变的事实，制造根据美国或中国法律并不属于非法的类药物。当监管机构确定新的芬太尼并宣布其非法时，经销商迅速转用新的芬太尼类药物。所以我们正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同事紧密合作，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

据美国媒体报导，鸦片类毒品在美国泛滥成灾，像瘟疫一般蔓延开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六十分钟”和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鸦片危机的源头可谓盘根错节。国会、游说家和药品贩售业者都难辞其咎。上亿的药丸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检验，就被送到了药局和诊所，作为止痛药，在过去的二十年以来，为鸦片危机推波助澜，造成了二十万人丧生。

罗森斯坦说：芬太尼在美国以多种形式销售，所有这些都可能致命。出售的可能是纯芬太尼，或是芬太尼与海洛因、可卡因、甚至大麻混合。有时被压制成药丸，被虚假地说成是处方阿片类药物而出售。使用者经常不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不知道纯度，也不知道药品的成分，这是芬太尼被证明如此致命的原因之一。

共和党众议员汤姆·马里诺(Tom Marino)本来可能被任命而领导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但他在五月份退出了遴选名单，理由是家人生病了。今日美国报则报导，背后原因是是他主导了药品业阻挠执法人员禁止可疑的鸦片制品进入美国的努力。



的综合优先组织目标或CPOT。他们被控违反美国法律。”

美国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缉毒工作队(Organized Crime Drug Enforcement Task Force, OCDETF)扫毒计划负责提出年度综合优先组织目标名单，列出“掌控”(command and control)影响美国最大量的国际毒品走私和洗钱组织的人士。

不是在那里制造的就是用来自中国的化学原料生产的，所以我们正在寻求中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打击这些实验室，并确保中国政府跟我们一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罗森斯坦还说：“中国的芬太尼销售商利用互联网直接向美国客户出售芬太尼。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使用多重身份来隐藏其真实位置，并掩盖了利润返回中国的路径。他们利

華盛頓郵報刊載文章譯文：

曾經從死囚身上摘取器官在壓力下，中國終於終止了這種做法

華盛頓郵報記者 Simon Denyer (西蒙·鄧伊爾)2017年9月15日報道

中國的器官移植體制曾經受到國際器官移植界的蔑視和憤怒，原因之一是醫生從被判死刑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並將其移植給那些支付高價獲得器官移植優先權的患者們。

多年前，中國曾經否認摘取死囚器官的事實。但是現在，中國承認了這一歷史並已宣佈不再會有此類操作模式——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位衛生部官員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位美國移植外科醫生的默默支持下，在短短的十年期間改變了這一體制。

這位衛生部官員就是黃潔夫。他克服了舊模式中的既得利益問題以及中國人民傳統觀念中對死後被解剖的厭惡，建立起一個志願捐獻者註冊登記系統。在這個新的中國模式中，捐獻者可以通過無處不在的支付寶登記註冊。目前，已有超過23萬的中國人進行了在線註冊。計算機數據庫將捐贈者與符合標準的潛在接受者相匹配，一旦器官可用，就會以短信的方式通知醫生。

現在，這種做法已經逐漸贏得了包括曾經強烈批評中國使用死囚器官的國外器官移植專家在內的專家們的信賴。

作為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澳大利亞醫生和國際器官移植協會的前任主席，杰里米·查普曼曾嚴厲譴責過中國器官移植體制。但現在，他也表示“中國已經朝着正確的方向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然而，仍有很多人對中國器官移植的現狀持懷疑態度，對中國的惡意譴責不絕于耳。

就在去年，美國衆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中國政府認可強制摘取器官”，並指責中國共產黨處決“良心犯”為移植醫生提供器官來源。

黃潔夫及其全世界器官移植界的同仁們對指控予以駁斥。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已經作爲一個金融和技術大國伫立于世界舞臺上，伴隨着國內中產階級的崛起和日益成熟，中國已經成功廢除了以往的不良做法。

當腐敗橫行

由於使用死囚器官，中國受到國際器官移植界的排斥。在過去腐敗、非人道的法律體制下，中國通過使用死囚器官建立起一個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移植產業。這個產業實際上是一個不受管制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器官不是分配給最需要的接受者，而是分配給出價最高者，由此而產生了巨大經濟利益，但同時也置醫德于不顧。

黃潔夫說：“經濟利益導致了弊端，器官分配已經變成了一場財富與權力的遊戲，沒有社會公正性而言。”

每年從死囚身上獲取的器官成千上萬。但在過去的十年間，黃潔夫獲得了中國政府最高層面的支持，並成功推動中國醫療機構摒棄了這一利潤豐厚的做法。

自2010年起，黃潔夫逐漸建立起的志願捐獻者註冊登記系統目前已經能夠滿足移植等待者的需求。該系統的建立是中國在器官移植領域的一大突破。

“弊端”的收益

中國2006年開始改革。黃潔夫首先公開承認“死囚器官是中國移植產業快速發展的基礎。”這一在業界的公開秘密。

儘管受到各種質疑，甚至有時是持續困擾其工作的無端指責，但是在芝加哥大學移植外科醫生邁克爾·米利斯的默默支持下，黃潔夫都頑強抵抗堅持改革，努力爲新建立的器官分配系統清除障礙。

在北京辦公室接受採訪時黃潔夫說：“過去的十年非常艱辛，是一場與強大的既得利益者之間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戰鬥。”

黃潔夫和米利斯都在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及其附屬機構中國醫學委員會(CMB)有密切聯繫的醫療中心工作。大約十年前，他們在洛克菲勒和中國醫學委員會主辦的一次大會中相遇，並發現了兩人共同的關注點——中國器官移植產業的運作模式。

兩人一致認爲，突然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是不可行的，只會導致黑市買賣猖獗。所以，他們決定逐步改變。在中國醫學委員會的資助下，黃潔夫邀請米利斯擔任重要的改革顧問，開始研究新的方法。

在不受管制的龐大體制下，中國擁有600多個器官移植中心。直至2007年中國立法禁止器官販賣和外國人來華器官移植旅遊後，經註冊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數量減少到160家左右。

在中國紅十字會的幫助下，中國人民走上器官捐獻的正軌。經過不懈努力，黃潔夫在獲得了中國政府的支持的同時也逐漸贏得了曾經對中國醫療行業持懷疑態度人士的支持。

黃潔夫稱，中國去年有4080名已故捐獻者捐獻器官，2201名活體捐獻者爲親屬捐獻器官，總共進行了13238台肝、腎、心、肺移植手術和器官移植手術，所有用于手術的器官均非來自于死囚。

黃潔夫說：“我們的系統透明且可溯源，並且知道每個器官來自于哪個捐獻者，每個器官又分配給哪個受者。”

雖然這可能夸大了實際情況。但是，黃潔夫的同仁們表示，“目前違規操作僅僅屬於個例，而非常態”。

死囚

中國法律目前並沒有明確規定可否使用從刑事法庭判處死刑的囚犯身上獲取的器官。黃潔夫本人曾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的中國媒體發佈會上表示，“死囚可自願捐獻器官”。黃潔夫現在否認了他的這些言論，並堅稱對醫院系統使用死囚器官“零容忍”。但由於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他今年二月在梵蒂岡大會上表示，“我敢肯定，現在存

在某些違法現象。”

律師于文勝(音譯)說，他的一個客戶稱，去年11月北京監獄一名被判處死刑的男囚收到一份表格，需要他簽字確認“志願”捐獻自己的器官。

他說，“死囚可以選擇不在表格上簽字，但他們會遭受更多的虐待和痛苦。如果簽字，他們死前的最後一段日子就會變得好過一些。”

然而，由於在2007年國家要求最高法院審查所有死刑案件之後死刑判決的數量急劇下降，死囚器官的供給似乎逐漸消失。

血腥的器官摘取

美國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斯雷提南闡釋衆議院譴責中國的器官移植體制的決議時宣稱，“我們不允許這些罪行在中國繼續出現。”她指責中國在“冷酷無情的獨裁”下對愛好和平的“法輪功”習練者施加迫害，以及在未經捐獻者同意的情況下以“令人發指的不道德的方式”摘取器官。

這一指控的根據來源于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加拿大前政治家大衛·喬高和記者伊森·葛特曼這三人多年的研究調查。他們聲稱，中國每年秘密進行6-1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大部分器官來源于自1999年“法輪功”被鎮壓後被秘密拘捕的“法輪功”學員。

但是，《華盛頓郵報》的研究和報道駁斥了這些指控。

移植患者必須終身服用免疫抑制藥物來防止體內移植器官排異。根據美國醫療保健信息企業昆泰提供的《華盛頓郵報》的數據顯示，中國免疫抑制藥物的需求份額在全球需求份額的佔比與中國所公佈的移植數量在世界移植總量中的佔比基本相符。

昆泰北京的客戶經理徐佳鵬說，數據中也包含中國的仿製藥。他說中國絕不可能暗中秘密進行移植以達到6-10萬例如此之多。

有些批評者指出，中國也可能暗地里爲大量器官移植旅遊外國人提供移植服務，所以使用的免疫抑制藥物不會出現在其數據中。但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世界衛生組織收集全球的移植數據信息，世衛器官移植項目主管官員何塞·努涅茲說，“與來印度、巴基斯坦或美國移植旅遊的外國人數相比，或與中國過去的移植旅遊人數相比，2015年，來中國移植旅遊的外國人數量是非常低的。”

查普曼和米利斯稱，中國每年的移植量遠超每年24000例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即使在過去中國使用死囚器官時候的移植量也不可能達到如此之多。

而且爲“法輪功”人員辯護的律師也否認了那些指責中國正在摘取死囚器官的言論。

“我從來沒聽說過器官取自于尚未死亡的囚犯。”梁曉軍說。他稱自己已經在民事案件中爲300-400名“法輪功”人員進行了辯護，而且他知道僅有3名或4名“法輪功”人員死

于獄中。

在中國，儘管國家抵制“法輪功”，但是如果“法輪功”人員憑空消失，其家屬可以說出實情，尋求正義。

專家們說，如果每年有成千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被判處死刑，那麼這些信息將會被披露的。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美國國務院和“法輪功”組織網站已經各自試圖預估中國政治犯的數量。他們預估的數量從1397名到“成千上萬”名——而這還比古特曼和其他人所說的50-100萬名少了許多。

她總是樂于助人

中國器官移植業具有象徵意義的標誌物是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座位于天津市東北部的14層大樓，是亞洲最大規模的器官移植中心。

在大廳中，一段視頻正在宣傳此中心提供的肝肺心胰專業移植服務每年挽救成千上萬名患者生命。

在最近一次訪問中，我們採訪了移植病房里少數的巴基斯坦、利比亞和中東患者。兩名巴基斯坦患者家屬說，他們自己帶了捐獻者來此，儘管其中一人承認其捐獻者與接受者沒有親屬關係，這違反了中國法律。

這些家庭表示，他們需要支付7-8萬美元的手術費用。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公共關係部(移植中心的運營部門)部長魏國欣(音譯)說，“對中國使用‘法輪功’人員器官的指控簡直是荒謬可笑，這是反華陰謀的一部分。”但是，隨後我們請求瞭解在中心進行的移植的數據和外國病人的數量，她沒有做出回應。

但在北京，醫生說，志願捐獻者源源不斷地爲移植手術提供器官。

當72歲的陸文(音譯)在除夕夜突發腦溢血，靠醫療設備維持生命時，丈夫趙宏希(音譯)毫不猶豫地同意將妻子的器官捐獻用于挽救他人的生命。

“她總是樂于助人，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工程師、忠誠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趙宏希說，“如果這些器官有用，應該將其用來幫助別人，這也是延續我妻子生命的一種方式。”

兩個女兒很快就同意捐獻母親的器官，儘管47歲的趙薇說她起初有點猶豫：她曾經想在停止維持設備的時候握住母親的手，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醫生必須迅速地切除母親的器官。不過，她說，“我很快就認可了捐獻器官的這個想法。因為她信仰基督教，所以接受了家人的決定。”

她說：“當我在醫院樓下等待母親離世的時候，我強烈地感覺到母親帶來的無限愛意。”

